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Cultural Exchan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Makeup in the Tang Dynasty

Cui Xinfu

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China

Email address:

499088198@qq.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Cui Xinfu.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Cultural Exchan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Makeup in the Tang Dynasty. *Science Innovation*.

Vol. 11, No. 5, 2023, pp. 205-210. doi: 10.11648/j.si.20231105.12

Received: September 5, 2023; **Accepted:** October 20, 2023; **Published:** October 31, 2023

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 with its rapid social development, practiced a policy of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adopt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foreign relations, interacting a lot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In the citie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hu people, either as emissaries of other countries or as traders. It was their presence that facilitated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the Tang Dynasty, and gradually integrated the cultures of many ethnic groups into the Tang society. The facial makeup of Tang Dynasty women is one of the typical types of influence. It was complicated and ornate, with a fixed order and makeup requirements. After absorbing the features of foreign cultures, it fused the makeup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ern peoples, forming a unique type of female makeup and bringing about an unconventional and unique style. This paper mainly combs and analyzes the parts of female makeup in the Tang Dynasty that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and explores the role of inter-ethnic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makeup in the Tang Dynasty, so 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multi-ethnic cultural exchanges on the aesthetics of social life in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Women's Makeup, Cultural Exchanges, Ethnic Culture

民族文化交流对唐朝女性面妆发展的影响

崔心芾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苏州，中国

邮箱

499088198@qq.com

摘要: 唐朝政策包容，社会开放。其与西域各族的交流，使西域多民族的文化进入中原，逐步影响唐朝百姓的生活习俗。唐朝女性的面妆即是受到影响最为典型的一类。其在承袭前朝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特点，融合了西域民族的妆容特色，产生了独特的女性面妆类型，带来了不拘于世俗的独特风尚。本文主要就唐朝女性面妆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的部分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在唐朝女性面妆的发展中所承担的角色，以此探究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对于唐朝社会审美和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 女性面妆，文化交流，民族文化

1. 引言

唐朝是一个包容并蓄的时代，其开放政策较前朝更加大胆。在唐朝的城市中多见胡人身影，他们或为他国使者，或为往来行商。正是他们的出现，促进了西域多国及地区与唐朝之间的交流。而丝绸之路的发展，更使得多民族的文化，逐步融入唐朝百姓的生活中。当时女性的面妆即是在此背景下，从妆容造型到色彩以及相关妆饰用料都受到了西域多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使得传统汉族女性的妆容逐步发生变化，融入西域多民族妆容的特点，从而出现极富唐朝开放特色的面妆类型。从这种女性妆容的变化中，同时能看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审美习惯。本文将从唐朝女性面妆较传统出现的变化出发，总结唐朝时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化的女性面妆类型和特点，探讨民族文化交流对于唐朝女性面妆的影响。

2. 延续传统，大胆创新的唐朝女性面妆

唐朝女性的面妆类型丰富，尽显大唐盛世之风。唐朝与西域交往甚密，胡汉往来频繁。这里的“胡”，主要包括居住在唐朝北部与西部地区的突厥人、回纥（鹘）人、吐蕃人和契丹人等。[1]这使得汉族的本土文化与西域各族文化相碰撞，逐步改变当时人的衣食住行习惯。当时女性的面妆也逐步与西域多民族的妆容造型相结合。

2.1. 打破传统的色彩使用习惯

唐朝女性的面妆总体来说讲究细节并延续传统。汉族女性的妆容基础是上妆粉和胭脂，形成一种红妆的造型[2]。这在现今出土的唐朝壁画（图6）上清晰可见。而随唐朝社会发展，汉族女性效仿胡人的面妆，逐渐产生新的时尚。最为典型的是血晕妆和啼妆。以啼妆为例，画此妆者脸上仅敷白粉，倒撇的八字眉再配上颜色深厚的唇妆。这样的妆造看似简单，实则各部都要把握好度，不能描画过于厚重。但这种与传统红妆完全不搭的造型，在当时颇受争议。

同时，女性眉妆的色彩应用也有了新的变化。唐朝的眉妆造型有很多，暂且不表。单从色彩上来看，当时女性的眉妆仍以黛为主。而在唐朝，西域与中原之间交流紧密，让新的染料类型进入唐朝，这使得黛色在眉妆中的呈现逐步产生区别，形成体系。

2.2. 样式造型的胡汉融合

上段中提到了啼妆，现在再来看血晕妆，这种妆容丧气感十足，与啼妆有过之无不及。《唐语林》中记述到：“长庆中，京城妇人首饰，有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美，谓之‘百不知’。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3]这种妆容看似怪异，实际在安阳赵逸公墓的壁画上就有类似面妆造型的女性形象（图1）。且这种血晕妆与吐蕃所流行的赭面妆的各种造型（图8）相类似。从这点可见，唐朝时的女性面妆在传统基础上逐

步吸收了胡人妆容的特色。虽然继承了传统的妆造步骤，但同时，也结合胡风进行了融合。



图1 墓室西北角壁画局部（赵逸公墓出土）。

2.3. 上层阶级中的流行

而唐朝女性面妆所发生的变化，更多的是从上层阶级开始。这要从当时的政治情况说起。执政的李唐皇室，对于外族采取怀柔政策。《贞观政要》中记载，贞观初（631年），平突厥，从温彦博议，迁突厥于朔方，降人入居长安者乃近万家[4]。这可谓是唐朝接纳外族入中原的重要一步。而李唐皇室本身就有与鲜卑族通婚的基础，在与外族交往时，所采取的态度和方式也更加包容。故此，在唐朝各大都市中出现的胡人数量逐步增多。且唐朝对外征战，在所占领地区建立都护府。使得汉族与外族百姓共同生活在当时已不是特例。

由此带来的生活习惯上的改变，受影响最为明显的还是唐朝的上层阶级。上段所提到变化的女性面妆类型，大多流行于贵族或皇宫中。从现实情况来看，也只有当时的上层阶级能负担此类面妆造型所需的材料，同时有时间以此为乐。在唐朝的胡人也有相关生活规范，《唐会要》中载：“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5]故此，唐朝时，汉胡之间的交流和通婚是常见的。这也为西域多民族文化传入中原，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进而影响到女性面妆类型的审美变化提供重要途径。胡汉人民之间的交往也被忠实的记录在唐朝墓室壁画中，如郭行墓中壁画《牛车备行图》，其中与侍女站在一边的胡人侍从（图2），又如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的《客使图》（图3）。这些典例都在提醒着人们，唐代上层阶级与胡人之间紧密的联系。正是对通商、上层之间的交往、通婚等多种民族间交流的方式的默许和支持，使得唐朝受到西域各民族影响的程度较前朝更为明显，同时为新的审美流行提供发展方向。



图2 《牛车备行图》局部（郭行墓出土）。



图3 《客使图》局部（章怀太子墓出土）。

3. 多民族文化影响下的唐朝女性面妆的变化

唐朝女性面妆丰富多彩。无论是样式，还是色彩，都呈现出别样的风貌。唐朝繁盛的经济贸易为当时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提供一大助力，加之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人们能接触到更多不同的文化。而唐朝女性也在这种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对自身妆容有了新的创意和搭配。

3.1. 主要变化的女性面妆类型

开放的唐朝社会给予西域多国或地区的人民来到唐朝疆域开展交流的机会，在这种机会下，物质交换逐步兴起，带来的是新的材料和技艺，这使得女性所用的化妆用品有所改良。而民族间文化上的交流，给唐朝带来了一股时尚新风，唐朝时的女性有充分的自主权，她们所受到的束缚相较于前朝明显得到了宽待，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外界的事物，其审美情趣也会随着眼界的开阔而变化[6]。

3.1.1. 眉妆：眉间青黛

在唐朝女性的面妆中，眉妆独特而优雅。在《全唐诗》中，“髻鬟风拂乱，眉黛雪沾残”[7]，“翠黛眉低敛，红珠泪暗销”[8]，“软碧摇烟似送人，映花时把翠眉颦”[9]，“绿眉甘弃坠，红脸恨飘流”[10]等诗句中提到的“眉黛”“翠眉”“翠黛眉”“绿眉”，结合全诗内容可见其形容的是女性的眉色。根据提到色彩样式，大致可以总结为翠、绿、黛三种。如果单从字义来理解这些颜色，在《说文解字》中，翠指“青羽雀也。出郁林。从羽卒声。”[11]绿指“帛青黄色也。”[12]黛指“画眉也。从黑朕声。”[13]由此可见，与画眉实际存在联系的是黛，其本身就有画眉之意，而翠和青实际代指的颜色也略有不同。且唐代女性的眉色与柳有联系，实际指女子在画眉时一般用青色细柳枝点着黛翠色的颜料描画眉毛[14]，这也可以与上文相呼应，即并不是说画眉染料的颜色偏翠或绿色，而是当时女性在画眉时，以青绿色柳条为工具。

故此，再来看这些所谓的“翠眉”“绿眉”就有所斟酌了。而实际从墓葬出土的壁画中，可以看到的女性眉色基本为黑色。如韦贵妃墓出土《舞蹈女妓图》中的女妓（图4）和燕妃墓中的《搦柳枝女侍图》的女侍（图5）。她们的眉型略有区别，但二者眉色皆为黛色。这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当时其实都是黛眉，而绿、翠是文人对女性眉色的美化和杜撰。另一种则是当时确实存在多种眉色，但因壁画颜料没有达到可以绘出女性绿眉或翠眉的地步，抑或是工匠没有仔细在壁画中去区分女性眉色的差别。而在上文中提到的《唐语林》中记载：“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这里的丹紫代指紫红色，指在长庆年间流行的血晕妆中的女性去眉这一步骤中，以一种紫红色染料涂在眼上或眼下。这是否能说明唐朝女性眉妆的颜色并不单一呢？实际上，还有种可能性，即是画眉用品的原材料所致。唐时从西域传来一种名为青黛的染料，可用以染眉。是否是这种染料名称给了文人启发，使他们能用更多元的词汇来形容女性的眉色呢？这还需继续深入探索。



图4 《舞蹈女妓图》局部（韦贵妃墓出土）。



图5 《拈柳枝女侍图》局部（燕妃墓出土）。

3.1.2. 妆容造型：奇葩的时世妆

唐朝女性的面妆在上妆步骤上仍遵循古制，但在妆容造型上别出心裁，特别在接触到西域来往的民众后，女性面妆逐步呈现一种不同以往的造型风格。以白居易的一首《时世妆》来描述唐朝女性的妆容造型：“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15]足见唐朝女性面妆造型之大胆。这种被白居易记录的在元和年间的时世妆，一反传统女性的面妆特点——唐代女性涂抹胭脂的时候会将会额头鼻子和下巴留白，以显面部红润之态[16]。仅打白色妆粉而不上胭脂，唇色加重，眉作八字，束发不留鬓，眼角斜红也不晕染。整个妆容使人感到惊悚，凸显白居易对当时女性面妆造型奇葩的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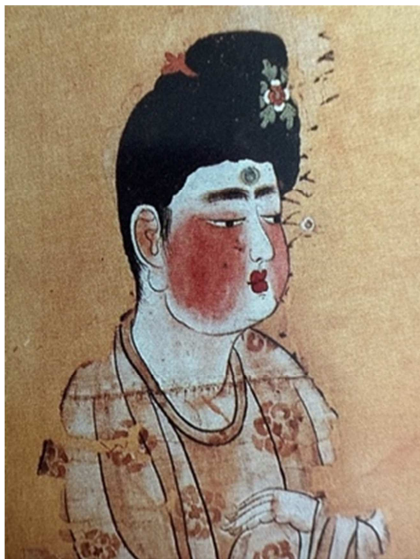


图6 《弈棋仕女图》局部（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



图7 《帐居、宴饮、射牛、侍女及双身图》中的女性局部（德令哈郭里木吐蕃墓出土）。

这首诗中还将当时的桃花妆和这种时世妆对比。桃花妆，红妆的一种，白粉为底，将两腮涂以红色，嘴唇也涂的很红。如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弈棋仕女图》中的女性面妆（图6）。而这种时世妆，应是一种白妆，如白居易在诗中所记，下垂的八字眉，深色的唇脂，白粉面，眼下两撇斜红，故意妆成一幅哭丧着脸的造型。这倒像是啼妆和血晕妆的结合。这两种妆容前后一对比，一喜一悲，让人感慨唐朝女性的审美偏好。而论及这两种妆容的来历，白居易诗中最后总结“非华风”。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和西域文明》中，认为“赭面是吐蕃风，堆髻在敦煌壁画及西域亦常见之。此种时妆或亦经由西域以至于长安也。”[17]实际出土墓葬中，也可找到与之相类似的图像存留。以德令哈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上女性的面妆（图7）为例，无论是乌唇，还是白粉面都找到了对应。

3.2. 女性面妆的变化所映射的民族文化交流特色

唐朝女性面妆的变化与唐朝的对外交流息息相关。无论是化妆原料的多样化，还是面妆造型的变化都离不开西域各民族在物质和文化上的影响。

3.2.1. 青黛的传入——外来物资进入

唐朝与西域的交流，为唐朝带来新的流行风尚。其中影响最大且最直接的即是物质交流。在唐朝时，丝绸之路兴盛，多个西域民族、国家与唐朝交往，带来了大量的物产交易。在上一段中，笔者猜测“绿眉”、“翠眉”的说法是根据原料在眉上所呈现的效果来命名，或是无关实际色彩，仅仅借绿和翠来代表使用的是青黛。而在《说文解字》中，青指“东方色也”[18]。这是一种介于绿和蓝之间的色彩。以与之相关联的绿和翠来代指，似乎说的过去。但实际上，结合上文对绿和翠的释义，翠与青之间的关系还较为紧密，而绿与青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的。而青黛这种染料，《本草纲目》中记载：“黛，眉色也。刘熙释名云：‘灭去眉毛，以此代之，顾谓之黛。’马志曰：‘青黛从波斯国来。今以太原并庐陵、南康等处，染淀瓮上沫紫碧色者用之，与青黛同功。’李时珍曰：‘波斯青黛，亦是外国蓝靛花，即不可得，则中国靛花亦可用。或不得已，用青布浸汁代之。货者复以干淀充之，然有石灰，入服饵药中当详之。’”[19]从此记录中，首先可确定黛是古人眉妆的颜色。而青黛来自波斯，价格昂贵，百姓用不起会用墨代替。在隋唐时期，女性用的较多的是螺黛，这是一种经过加工制造成为各种固定形状的黛块[20]。由此，唐代女性眉妆最终呈现的还是黛色，但随原料的不同，在细节上有所差异。《册府元

龟》中记载开元五年三月，康国王亦使献毛锦、青黛[21]。这是当前有关于青黛在中国出现的最早记述。而从当前可见的相关文献来看，“绿眉”“翠眉”的说法大频率出现在《全唐诗》中。依此，“绿眉”“翠眉”的说法很有可能是由于青黛的传入，带给了文人以灵感，在形容女性的眉妆时，以绿和翠来做点睛之笔。

3.2.2. 时世妆的源流——西域民族文化的影响

再回到上文所提到的唐朝的时世妆，这种看似古怪的妆容与当时吐蕃民族的妆容造型有所相通，现继续追溯源流。首先来看同时期吐蕃女性的妆容，从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中可以提取到的妆容有：



图8 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中的妆容（来自刘波《椎髻赭面——从安阳唐墓看中晚唐时期女子服饰中的胡风》）。

《新唐书》记载吐蕃民族的习俗：“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在有丧事时“居父母丧，断发、黛面、墨衣，既葬而吉”[22]。由此可见，这种妆容在吐蕃不分男女，大量采用红褐色染料涂面，且在特殊场合也有特殊的造型样式。

而唐朝与吐蕃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件事即是文成公主的出嫁，当时的吐蕃正处于松赞干布时期，《新唐书》中记载：“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自赭面，袈纟绡，为华风。”[23]公主入主吐蕃后，对当时的吐蕃习俗进行了整改，将汉族的风俗逐步带入。实际在当前可见的资料中还是可以看到吐蕃人赭面的习俗，上文中提到的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就是最好的印证。其墓主生活时期主要在公元8世纪末[24]，赵斌、张睿利、曾丽荣、雷小虎共著《汉唐胡服研究》中认为直至8世纪末的吐蕃，赭面仍然十分盛行[25]。由此可见，白居易所提及的时世妆与吐蕃民族赭面妆的联系颇深。可能由在西域地区生活的汉族女性受到影响，传到了中原；也可能是汉族女性受到当时来往于西域以及唐朝的胡人的影响。更有可能上述两种影响皆有。如上文也提到的远在中原的赵逸公墓中女性（图9）的妆容，下塌的八字眉配上看似是两道斜红的红斑。在与之同属安阳唐墓中的郭燧夫妇墓中的侍女（图10）妆容则略有不同，但八字眉和两腮变匀开的红晕，与郭里木吐蕃墓葬中的人物妆容相比较还是能找到相似之处。再加上上文提到的血晕妆和啼妆，足见当时西域民族文化影

响之深，以至于使唐朝的女性对此进行了改良和创新，形成独特的流行。



图9 墓室壁画局部（赵逸公墓出土）。



图10 墓室壁画局部（郭燧夫妇墓出土）。

故此，看似安史之乱后，百姓对胡人有所排斥，但胡风的影响在中原大地扩散，当时的人们看似是想摆脱胡风，实际从上层阶级已经开始自发的将胡风与汉族的喜好相结合。人们所抵触的只是表面的接触，实际其内中蕴含的民族特色已被百姓所接受并融纳。由此可见，对外贸易、与外交流，获益的不仅只有学习的一方。唐朝时，国家在对外输出自己的物质产品，他国也采取回应，如西域多国使臣的到访、商业上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联姻等，使不同国家、地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得到交流和发展，更是影响到了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唐朝女性能够将胡人妆容运用在自己的面妆中，且是从上层阶级开始，更是说明唐朝的强大，使她们乐于去学习、去接受，更是有条件的去创造新的汉族女性的妆容类型。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唐朝时受西域各地区民族习俗和生活文化所影响的女性面妆类型,进行了汇总和探讨。通过分析,可发现唐朝女性面妆受到西域民族文化的影响是一种必然。唐朝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包容的对外政策对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胡汉百姓得到交流。从女性面妆造型的具体细节上的变化,可清晰感受到唐朝女性对于外族文化的大胆接受和积极的创新。这种意识不仅来自于唐朝富足的经济实力,更来自于唐朝统治者对这种民族间交流的认同,并为此推出了相对应的法度,使得这种交流更加密切。这种女性面妆的变化是从上层阶级开始出现,而逐步流行。民族间的物质交流,也为女性改变妆容提供了原料。并不是所有西域民族的文化都影响到唐朝女性的面妆造型,而是唐朝的百姓接触到西域的文化,从中去选择符合自身审美的类型,加以与传统相结合。由此可见,受西域民族文化影响的唐朝女性面妆,是对唐朝民族大融合政策的清晰写照,是一种胡汉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的在当时独有的新时尚。

参考文献

- [1] (美) 陈步云. 唐风拂槛 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 [M]. 廖靖靖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121.
- [2] 周汛、高春明. 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7: 119.
- [3] (宋) 王谠. 唐语林 [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223.
- [4]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273-275.
- [5] (宋) 王溥. 唐会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1796.
- [6] 张瀚亭. 唐代宫廷女性服饰与唐代女性审美研究 [D]. 东北电力大学, 2023: 39.
- [7]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742.
- [8]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5051.
- [9]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402.
- [10]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6017.
- [11] (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新订 [M]. 臧克和、王平校订.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27.
- [12] (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新订 [M]. 臧克和、王平校订.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864.
- [13] (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新订 [M]. 臧克和、王平校订.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675.
- [14] 宋炀. 美人之美: 中西方古代女性妆饰与审美文化比较研究 [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 2017 (03): 111.
- [15]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4705.
- [16] 赵炜璐. 浅析唐代女性妆容的审美趣味 [J]. 设计艺术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13 (03): 119.
- [17]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8: 66.
- [18] (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新订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329.
- [19] (明) 李时珍. 本草纲目: 金陵版排印本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897.
- [20] 周汛、高春明. 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7: 124.
- [21] (宋) 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11237.
- [22] (宋)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072.
- [23] (宋)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074.
- [24] 谢静. 敦煌莫高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族服饰初探——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为中心 [J]. 敦煌学辑刊, 2007年, 02: 73.
- [25] 赵斌等. 汉唐胡服研究 [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0: 184.